

Famen Temple

法门寺文物图饰

法门寺博物馆
韩 生 编著

文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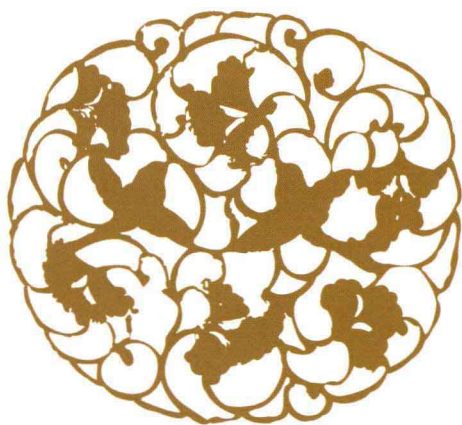
法门寺系列丛书之四十一

Famen Temple

法门寺文物图饰

法门寺博物馆

韩 生 编著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门寺文物图饰/韩生编著.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010-2608-1

I.法... II.韩... III.出土文物 — 扶风县 — 唐代 — 图集

IV.K873.41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6587号

责任印制

张道奇

责任编辑

王 伟 杨新改 李 红

装帧设计

李 红

Famen Temple

法门寺文物图饰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制版印刷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965 × 1270毫米 1/16

印 张

29.75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2608-1

定 价

580元



静观千年法门遗珍

葛承雍（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博导）

在中国五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国度里，宗教历史一直是国人关注的热点与焦点，因为宗教关联着人的信仰与理想，伴随着人的喜悦与悲哀，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生活秩序，影响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心愿。所以，1987年被誉为千年名刹的法门寺佛指舍利的出现和唐代佛教艺术文物的出土，曾引起亚洲佛教圈子内各个国家与地区的震撼，也引起全球范围的兴趣，传奇式的故事到处讲述，成了“高端节目”的传播者，人们从中吸取了很多的灵感，澄清了围绕法门寺和唐代佛教的所有传说，因而掀起了一次次争相目睹、礼拜敬佛的热潮，从泰国到韩国，从香港到台湾，许多电视台纷纷推出宗教揭秘记录片，描述文物探秘的新发现，期盼能寻找出光照人间的永恒魅力。

但是，电视传媒只能做几分钟一晃而过的欣赏，一眨眼往往意犹未尽，不能认真观察与分析研究，要弥补这样的缺陷，大型图录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纸质媒体就会继续吸引着广泛的读者，特别是一部收录齐全的法门寺文物图饰大型图录，有着广阔的佛教文化背景，更是人们翘首期盼的和强烈关注的，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贴近了研究者的眼睛，让人们在审美中细细品味千年前古人的智慧创造，领会中国佛教文化的博大精粹。

图录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它能把我们的感知浓缩于一个狭窄的空间，一个凝固的时刻。图与人类的文明史密切相关，早在文明的萌芽期，图画就以其直观明了赢得人类的青睐，图画遂成为人类纪事的最早方式之一；文字产生以后，绘图画片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图”与“书”二字往往并连使用，所以，有“图书”一词。现代意义上的“图”包括照片，甚至没有底片的数码图片，对文物来说照片就是直接映象物体，比起线描手画更具真实性和准确性，而且犹如今人与古人之间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这样看，图片能让人如此动情大概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不要忘记，感情代替不了理解。通常说来，如果要对一事物作出判断，仅靠图片提供的信息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情感能给理智以力量。如今我们这个世界被图像紧紧包围，图书出版配图是一种潮流，有其好处，也有其坏处，好处是照片的作用：它令人难以忘怀，记忆不会断裂。坏处是叙述越来越简单，思考也越来越少，撰写的文字越来越差，甚至只剩下一句简单的说明或介绍。学术界对一件文物不同的看法，研究观念的激烈碰撞，话题延伸的深度和广度，所触及文物的价值判断，往往在当今图书中被一概删去了。

围绕法门寺相关的图书林林总总，二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不少了，有的精美有的平庸，有的繁杂有的简单，从考古报告到讲解说明全都面世，但作为一部既搜罗齐全又细节清晰的大型文物图饰画册还比较罕见，我与法门寺博物馆多位研究专家商谈过要出版一部这样的图录，经过近十年的曲折磨合，终于现在编辑成功了。

这部法门寺文饰图录犹如一部珍贵的档案，其意义恰恰在于，它向世人昭示了唐代岁月中的佛教颠峰起伏，它为现代人类最大规模地提供了一个唐代重佛、崇佛的全景式记录。其中许多文物图片资料是首次介绍给海内外广大读者，如果永远封存这些珍贵资料，那就会成为僵死的文化遗产，从而失去其公共价值、研究价值、鉴赏价值。现在全面公布这些资料，实现了从古代宗教文化财产向现代公益性文化遗产服务的转变，比放在文物库房里价值远远要高，让公众重新获得了对历史的一次阅读和阐释权利。



比起文字记载来，读图在发掘历史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法门寺的文物图片可称为“图像文献”，这本图录收集的就是经过编撰者多年来悉心筛选的1500多幅照片，但它们的价值远远超出一般的历史照片，而是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三者合一文物图片，有些照片是发掘时拍摄的，随着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变化，不可能再现，只有这些照片完整保留了真实的场景和文物的原状，是最早的资料证据。作为文化遗产忠诚守护者，为了确保文化记忆的延续，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细节汇集起来可以写出一本动人的故事书，我就不再一一叙述以免脱题，但他的敬业精神已彰显在这本图录之中。

中国很早就有左图右史之说，读图可以证史，或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或订正文字记录的谬误，许多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通过出土文物图片证明马上水落石出，或是通过文物细部精微的勾勒迎刃而解，这就是“图录有征”的证据可靠性。唐代后期史书记载的法门寺迎佛活动，皇家喧嚣一时，百姓如痴如狂，曾长期被人们怀疑是否真实，但现在只要一看出土文物图录，观察那些本真状态的写照，便不会再产生歧异，这就是图录证史的作用。

考古学家不厌其烦的挖掘文物，归根到底是为了拿证据说话，而编撰出版文物图录，也是为了让材料与事实说话。我曾在1990年首届法门寺历史文化国际文化讨论会上发表过《法门寺出土珍宝与唐代内库》一文，就是说明唐代长安皇家内库的大量珍宝被奉送给法门寺，而出土的几件金银器皿上恰恰就有篆刻的或是墨书的“内库”二字，文物完全印证了我的论断，法门寺作为皇家寺院得到了文物的证实，千年前的历史被后世出土文物所映证，当时我的心潮起伏久久难平。2005年在法门寺·正仓院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与几位日本学者讲过唐朝国库制度对日本的影响，其中长安“左藏”“右藏”“内藏”与奈良、京都“大藏”“内藏”的渊源关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见过一本日本正仓院全部文物收藏的大型图录，不知东海彼岸何年何月才能整理完毕出版公布。

正因为一部法门寺文物图饰资料齐全的图录对我们了解古代佛教世界非常重要，因而收集编纂的工作就也非常艰辛，我们随手从现在这部图录中就能翻检出许多以前未有公布的材料。

例如过去往往不经意间被忽视的石刻文物，一般认为也就是些残破石碑，长期无言地散落在寺院内外，可是它们却有着不能小瞧的价值。1981年法门寺钟楼倒塌时发现的《北魏题名碑》，上面刻有北周独孤氏、宇文氏等女性姓名，反映了当时妇女礼佛寺院的状况。《法门惠恭大德之碑》碑侧线刻有高鼻深目僧人踏山云游图，说明了外来高僧弘法的形象。《惠恭支提之塔碑》上图刻有手捧细颈壶和长条盘的一对梳髻侍女，唐代女性形象栩栩如生。此外金代《法门寺藏经碑》记述了寺院收藏修补佛教经典文献的传承过程，映证了“关西名刹”的地位一直延绵不断。

本书中有一件宋代石刻过去不太引人注目，这就是刻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的《法门寺浴室院暴雨冲注唯浴镬器独不漂没灵异记》，它与收入《金石续编》卷一三《法门寺浴室灵异记》相同，对当时寺院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作用研究非常重要。据石刻记载，陕西扶风法门寺之浴室院，自唐僖宗乾符年间（875）迄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百年间每日供僧俗千人沐浴，除污垢疗疾病，未曾中断过，这是“缁侣云集、凡圣混同”的善举之一。浴室院还有浴室社长（时社长为王重顺）与社众，可见经费或出自于这些社众，或由寺院经济承担。我曾想，法门寺作为一个皇家道场、西府名刹，浴室院能提供每日千人洗浴，其规模应该不小。凡浴室院之设必有盆镬，购薪买炭，建大镬以化汤，筑方井以汲水，凿渠道以引泉，冬用暖堂，夏用凉堂，僧众老少皆宜。唐代寺院沐浴管理上常常击鼓以为进退，人员杂沓则不许喧哗，在沐浴中静静地享受佛祖温暖的恩赐。洗涤尘埃、祛病养生的沐浴，是寺院组织推动的社会福利事项，佛教寺院必和地方公益事业紧密联系，服务百姓奉献众生才能吸引信徒。寺院僧侣积极介入地方公益事业，自然与福田思想和因果报应有关，但寺院扮演社会世俗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一定与其慈善救



济（养老、医疗、济贫、浴室等项目）分不开的。此类问题倘若和地官出土的浴佛银盆等文物结合继续细化研究，定会收获不小，对我们现代社会多些惠泽苍生的善举是否有点启示呢？

类似的石刻文物不止这一件，还有许多明代塔砖铭刻题记，传递了当时施工、施舍、庙会等一些历史信息，足证法门寺文化研究内容丰富，内涵深远，目前通过文物实证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1981年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坍塌后，从明代到民国期间的68尊塔上佛像和宋刻、元刻佛经以及手抄本佛经散落废墟四处，后经扶风县文化馆保存，但一直没有集中公布，这次编辑者搜罗展示，为明代以后法门寺地区佛教香火延续提供了重要证据，不仅资料性弥足珍贵，而且为人们了解法门寺藏经真相提供了难得标本。尤其是法门寺宝塔倒塌时的影像记录，更使人有如亲临现场的感觉，仿佛千年来的精神信仰殿堂在心中轰然倒塌了。法门寺是唐代皇家佛事地位极高的内道场，更是中国古代佛教史屈指可数的高等级寺院，但是长期以来无人投资保护，作为文化遗产最后被雨淋风吹摧毁坍塌，本身就足以说明文化保护的脆弱性。现在我每次看到这些影像图片，就有一种分崩离析的失落感，图片使我们不再患有“失忆症”，不能再淡忘这些民族文化遗产一定要亟须保护。

历史真是太容易被淡漠了。历史的真相也是极容易被掩盖的。幸亏有了文物的流传，不仅填补了历史场面的空白，而且一次次激活了我们对千年以前历史的关注，特别是出土的顶级国宝文物，让我们不再是远处聆听古刹钟声，而是融入到佛教文化情景之中，穿梭于菩提树林之下。

令人惊讶的是，隧道石门门楣上白粉书写的梵文题记，表明可能有“胡僧”参与了地宫的布置与封闭；而隧道石材上众多写字与刻字所显示的人名，有迎送官吏，有施工工匠，大家争先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此，究竟是要将供养身份流芳百世还是要封闭地宫担负责任，值得进一步研究。由此考察地宫的文物放置不是随意的摆设，完全可能是一个佛祖舍利供养坛场，作者为了使人们一览无余仔细观察，还配以清晰地地宫器物分布线描图，使我们对地宫文物出土原状有了直接的感受，保存了当时现场珍贵的场面。当我们看到一幅幅宝函图片清晰的原状时，看到那些宝函上镌刻的记载文字时，不由得体悟到真要感谢考古工作者的悉心呵护，使这些国宝级文物完好无损传流给后人。如果说影像图片使考古瞬间被凝固下来，那么印刷在图书上则是最好的传承载体了。

编纂者显然是有心之人，他把唐代地宫填土中出土的残损石刻，一块块排列出来，这不是一般地器物排队，而是展示了文物的细部价值，有人物造型，有灵帐垂穗，有灵兽基座，有龙盘宝珠，特别是众多供养弟子合十跪拜石刻线画，男子虔诚，跪姿直挺，女子温婉，手捧莲花，个个慈眉善目，人人肃穆庄严，使人联想到敦煌佛教石窟中那些供养人的形象，两者如出一辙，艺术创造心心相映。这是我们以前所未见的珍贵图像，值得注意。同样，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瓷器、琉璃器等等瑰宝也被一一按细部排列展示，原来一些不甚清楚的文物细节真貌现在全部显现在人们眼前，伎乐中的胡人舞蹈，跪坐圆毯上的抚琴吹箫，两人对坐下棋饮茶，农夫抗锄离开家人，卷草纹饰中的水禽，狂奔速跑中的野兽，……真是难得呀！法门寺博物馆我去过多次，从文物展览到地下库房也都浏览过多次，但只有经过这次图饰细节的对比，才能感到文物背后的一记重音，才是真正地享受到了艺术带来的无比喜悦，一部精美的文物图录就是一座流动的博物馆。

漆木器的科技保护在中国北方一直是一个难题，法门寺的檀香木函、檀香木微雕人像、描金檀香木山、以及已经残损的檀木浮雕，因为过去处于严格保护下都一直秘而不宣，这次在文饰图录里也开始露面，对研究者来说十分重要。至于澄澈晶莹的玛瑙、水晶、琥珀等文物精品均亮相于图册之中，它们以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佛教文化的精神信仰。

我还注意到在《献物帐碑》中记录有蹙金鞋、紫鞞鞋等，实物中首次发现的金银结条鞋，是用银丝编织的，以前国内考古出土的多为用丝、麻、葛类等材料编成，这次见到的银丝编织鞋虽然毁损严重，但不难看出它原来是非



常精美的六角形纹，鞋帮内还衬有丝绸，鞋口上斜纹绲缘边，鞋面上装饰有掐金丝盘六瓣团花。在美国私人收藏家安思远的手中曾有类似这样精美的唐代金丝女鞋，有人怀疑是赝品，如果看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双供养鞋，就不会产生假文物的疑问了，这种可参照对比的标准器文物以前确实罕见。

最后要说的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丝绸织品，也是由于文物保护技术不过关的问题，原来博物馆展柜陈列给人们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照片，或是一些现代仿制品。在陕西考古研究所科技部门恒温藏室内，我曾看过一些经中德专家合作保护过的法门寺丝绸样本，尽管美轮美奂，可稍有振动即会脱丝掉渣，所以出土后的丝绸一直是藏在深闺人未知。可喜的是，这次图录中展现了当时出土时丝绸的原状，如金银平脱镜镜衣，紫红罗地蹙金绣织物，斜菱格对凤织金锦，都是不可多得的物证，显微镜放大的织物结构犹如纪实性绘图，直观地反映了唐代纺织工匠的高超技艺。丝绸保护专家王予先生曾告诉我绢丝包袱上有亭子建筑的织绣图案，可惜这次图片并没有局部清晰显现，看来丝绸保护问题真是迫在眉睫又亟待突破，以便拂去岁月的尘埃展现原貌。

过去总说中国是丝绸起源古国，是丝绸之路起点的大国，在人们印象中也就是常见的丝织品，而法门寺出土丝绸带给后人的意外惊叹，则是唐代纺织品中制作奇异的想象，精巧的构思，各类纹样仿若充满神秘与悬念的斑斓图画。这不是泛泛的上乘之作，估计至少是皇宫少府寺或文思院里匠师的制造，而不会是京城内一般手工作坊织造，那些丝绸织物上的蹙金线，已不是千针万线的缝纫，而是千锤百炼拉丝而成，成为古代丝绸世界的翘楚。

对法门寺文物全貌的关注，一直是人们的渴望与期待，过去中国出版经典性质文物图录的出版社寥若晨星，为数不多，除了文物出版社外，很少有人愿意投巨资制作精美的文物图录画册，现在编辑图文并茂的历史出版物在国内已经形成一种发展趋势，而且印制越来越优良，设计越来越精美，这对放大文化视野改变文字枯燥论述无疑有好处，起码图册的形象性、直观性有着积极意义。

但在我国通过“读图”来“读史”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手艺”，“以图证史”也是学术界新鲜但也有不同看法的一个新课题，期望用文物画册来搞通俗的普及读物，往往容易走向泛滥和无度，甚至走向倒退伪造的陷阱。故有学者调侃中国制造的“读图时代”太过浮躁功利，引导的是快速消化阅读而不是对优秀文明成果的品味欣赏，造就了一批无文化根基的表层化读者，因此屡屡呼吁出版经典文物图册为文化遗产充值，为文化经典补液，特别是通过一些原本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文物图饰细节，恢复并进而提高文物经典图书所蕴涵的荣誉，让中国文明真正在世界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同意这些学者的看法，期望文物图典在新一轮的文化大潮中再度辉煌。

法门寺文物图饰收集整理出版无疑是珍贵的，文物所凝聚的文化信仰无疑也是激励传人的一种方式。尽管我们不可能再恢复历史的场景，但是文化的递传却离不开过去珍品的精美图册。

我们生活在一个宗教长期存在的时代，一个人可以不信宗教，但可以对宗教投以兴趣、报以回应、进行研究。尤其是佛教自汉晋以来对中国人信仰的影响绝非一般，隋唐又是佛教兴盛的黄金时代，留传下的文化遗产有着无限宽广的世界，所以，有文化的读者不能不翻阅这部丰富细致的图册。

我们相信，在历史上有着璀璨光辉的法门寺文物终究有朝一日会腐朽褪色，烟消云散，但那些珍贵的文物图饰形象永远不会销声匿迹、劫难磨灭。因此，阅读、收藏一部这样有分量的图册也是一种文明共享，使得中华遗产永世留传。

2009年2月19日修改于北京城南居



法门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李斌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87年4月，封闭了1113年的法门寺地宫重见天日。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唐懿、僖二宗等供奉的金银器、秘色瓷、琉璃器、茶具、石刻和丝绸等数千件稀世瑰宝惊现人间，在海内外刮起“法门寺热”旋风。难以数计的诸国政要，专家学人，佛教徒和平民百姓，潮水般涌来，观赏大唐帝国灿烂辉煌文化，拜谒佛祖真身舍利。一门崭新国际显学——法门学诞生了。昔日僻处西北乡间小镇的法门寺，变成全球聚焦的佛门圣地。周边神话般崛起一座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城市，恍如隔世。

法门寺博物馆，在学术界支持下，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历史、佛教、考古和文学艺术综合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绩。

随着法门寺影响越来越大，法门学研究深入发展，人们的期望也与日俱增。一个迄今为止较全面系统地辑录并论述法门寺文物的大作——《法门寺文物图饰》，在牛年伊始杀青面世了。该书由绪论、石刻文物、真身宝塔、唐代地宫、地宫文物、法门寺地宫唐密佛舍利供养曼荼罗、法门寺文物装饰艺术等六章组成，凡文物1200余幅，论述20余万字。

《法门寺文物图饰》的编著体例独特，颇具匠心，它处处为人们最有成效地使用它着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辑录了许多新文物图饰

1987年5月，我有幸参加了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鉴定会。在荷枪警卫处，零距离目睹了从保险柜捧出的佛祖真身舍利等。其后相继参观了法门寺博物馆库藏、文物陈列，阅读过正式出版的法门寺地宫发掘简报、大事记、寺志、丛书、图册、论著引录的题记、题文等。而《法门寺文物图饰》中许多文物图饰却未曾见过。例如页22《北周题名碑》、《千佛碑》。页23《唐故府君德幢》。页24—25《法门惠恭大德之碑》阴、阳、侧面拓片。页26《慧恭支提之塔碑》。页32—33宋代石刻。页34—38金代石刻。页39—41明代石刻。页42清代石刻。页43—44其它石刻。页46明代铜舍利塔，及塔内永乐八年锡牌、舍利塔塔门。页47明代铜舍利宝塔内各色珍珠、玛瑙串饰。页50，1981年8月24日至8月25日法门寺塔坍塌时的影像记录。页51—56，1982年12月测绘真身宝塔图、塔体裂缝、题刻、塔刹及拆除。页57—59塔砖题刻。页60—67塔上佛经。页68—69朱子桥写经。页70—102塔上佛造像。页107地宫塔基。页130—144地宫出土其它残石。页108地宫隧道石地板上一层唐代铜钱。页114地宫前室门框里两侧阴刻武士拓本。页116地宫前室门额石阴刻佛像拓本，东门框背面阴刻蔓草纹拓本，东西侧阴刻菩萨拓本。页118地宫前室地板石阴刻拓本。页119地宫前室西壁砌石和地板石阴刻题名、花纹、天王像拓本。页129地宫后室秘龕。页174—176彩绘双檐汉白玉灵帐菩萨、佛像、供养人、天王。页210摩羯三钴杵纹铜圆盒。页211开元二十九年石函。页212开元二十九年石函内开元通宝铜钱及函盖题记。页236素面银香炉并碗盏。页272八棱净水瓷瓶内盛放各色珠子。页273白釉瓷碗及白釉葫芦瓷瓶。页290素面圆底细颈蓝琉璃瓶。页296十字团花纹蓝色琉璃盘。页297枫叶纹蓝色琉璃盘。页312银棱壶门黑漆木



茶碾座。页343—346地官出土的钱币。页351—353八重宝函最外层檀香木宝函残片。页354王母对纸底描金银首饰、小海螺、鎏金银戒指、琥珀狻猊。页366水晶枕。页367琥珀念珠、水晶球、珠、花蕾。页368鎏金银花饰。页369琥珀、玛瑙、玳瑁石饰件。页398金银平脱镜镜衣。页400斜菱格对凤织金锦。页401四门纯金塔绢袱。页408—410地官丝绸纹样等。

学术贵在创新。一部论著的价值，在于它有无新资料和新观点。《法门寺文物图饰》上述新文物图饰，既能弥补空白，纠正已出版录文的失误，又为海内外学术界提供了众多美不胜收的新信息和新研究课题，使人们对法门寺地官及其文物的了解更趋全面，有利于法门学研究更好开展。

二、突出文物图饰细部

过去我见过的正式发表的法门寺文物图录，一般是平面形象，因篇幅、印刷技术等原因，缺乏细部展示，不便研究。《法门寺文物图饰》的一大亮点，是用显微镜，将一些重要文物的细部，分解，放大，特写，肉眼难窥内在特质的底蕴，淋漓尽致地凸现眼前，为更有成效地认识、研究它，提供了准确依据。

例如页390—392显微镜下所见夹袱织物结构，有绳纹为地，重以白色大小方形斜线纹、黑白大小圆圈纹、绳纹和粗细绳等图案。页402显微镜下所见绢织物结构，大中小三种方形纹，组成疏密不一的六种图案。页404—405显微镜下所见织锦结构，11种粗细不同长形组成经纬明暗相间，似蛛网、如竹篱、类编筐等形图象。页407显微镜下所见绫织物结构，小方形组成的横向、粗细长方和小方形组成的竖向、更粗长方形组成经纬随意的图案。页411—412显微镜下所见蹙金绣织物结构，在绳纹地上，用捻金线盘绣出如意流云、宝相莲花和折枝花等纹饰。页200—203鎏金铜浮屠，塔刹的六圈相轮，光影明暗，圈之正斜，视之似有飘动之感。塔身平缓，屋顶翘起，单檐，斗拱，人字樑，直棖窗，甚至人字樑与屋顶交接处内部结构，也历历在目，是十分典型的唐代佛寺建筑。塔基的须弥座、护栏、踏步，层次、明暗、纹饰和人物，清晰可见。页285五瓣花口内凹底秘色瓷碟，内外壁纸痕，碟沿丝绸迹，碟底白色支烧点，透视出它的包装和烧制工艺。页379—386蹙金绣佛衣，用捻金线盘绣出流云、山岳、卍字、宝相莲花和折枝花（花蕊缀红宝珠）等纹，穿插在纵横交栏界内外，在紫红罗地映衬下，绚丽华美，又不失释氏庄严。

此外，页128宝帐镜花，页195—199彩绘四铺首阿育王石塔，页228—234鎏金双鸾团花纹大银盆，页238—240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页245—247鎏金象首金刚五足朵带铜香炉，页251—252鎏金双娥纹银香囊，页260—261鎏金双轮十二环银锡杖，页269—270银阙伽瓶，页303鎏金飞鸿毯路纹银笼子，页304—307金银丝结条笼子，页308—311鎏金鸿雁纹银茶碾槽子，页317—318鎏金银龟盒，页323—326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页327—337鎏金人物画银坛子，页355—357彩绘石雕狮子，页358—365彩绘石雕西方广目天王等四天王，文物图饰的经纬结构和纹饰，也各有千秋，异彩纷呈。

法门寺文物图饰的细节，充分展现了它们制作工艺精湛绝伦，人物形象鲜明生动，飞禽走兽栩栩如生，花卉线条丰富多采，色彩深浅浓淡相宜，佛门俗世和谐共处，布局奇特，层次分明，疏密有序，立竿见影。既便于人们看清时人制作这些瑰宝的流程，内涵，匠心，空前的成就，又为今人学习、借鉴提供了操作性强的范本，以继承这些优秀文化遗产，创造出适应当代需要的更新更美的精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

三、保持文物图饰的出土状况

过去出版的论著和图册中，法门寺文物图饰的出土状况有所反映，却不够丰富、全面。《法门寺文物图饰》是否全面，不得而知，比已出者多，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页147地官前室、中室器物分布图，页148地官后室第一、



二层器物分布图，页149八重宝函出土状况及其外已散架的檀香木函，页165金筐宝钿珍珠装盖顶纯金宝函出土状况，页168金筐宝钿珍珠装珙玦石宝函出土状况，页171彩绘双檐汉白玉灵帐内丝绸包裹的铁函，页172—173彩绘双檐汉白玉灵帐，页178盖顶铁宝函，页179鎏金双凤纹宝盖银棺及第二枚佛指舍利出土状况，页182—183五重宝函及其铁函出土状况，页185鎏金四十五尊造像盖顶银宝函出土状况，页189五重宝函第三函——银包角檀香木宝函出土状况及残像，页191—193嵌宝石水晶椁子、壶门座白玉棺出土状况，页201鎏金铜浮屠出土状况，页204鎏金迦陵频伽纹壶门座银棺出土状况，页207智慧轮造金、银宝函出土状况，页272秘色瓷出土状况，页347银棱包角檀香木宝函，页374地官前室阿育王塔前放置的丝绸，汉白玉灵帐顶部放置的丝绸，地官中室铜香炉放置的丝绸包袱。页375—378地官各类丝绸包袱出土状况，页379蹙金绣佛衣出土状况，页392宝相莲残绣袱，页393—394盖顶铁宝函，页395—396其他包袱。

这些文物图饰的出土状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一，它是文物图饰的原始状态，真实面貌最佳研究对象。其二，包裹瑰宝的丝绸包袱、系带，纸画，因地官封闭不是天衣无缝，空气、水等千余载的浸蚀，多已炭化朽烂，仅见蛛丝马迹，或残存物，犹可想见当年唐人用它们包裹及演变的情景，增加感性认识。其三，这些丝绸包袱、系带和纸画，本身也是重要文物。内容例如页393盖顶铁宝函上织品包裹，已脆、炭化，蚕丝不见，而不朽的金属花卉、蝴蝶等，仍熠熠闪亮。页275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页277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页278侈口秘色瓷碗、页280五瓣葵口大凹底秘色瓷盘、页281五瓣葵口小内凹底秘色瓷盘上的纸画，均为“仕女图”，即唐中叶著名画家周昉代表作《簪花仕女图》。此图见于秘色瓷包裹纸上，反映了它在晚唐的流行，当时印染工艺的发达，是今存难得一见的唐画精品。其四，从这些文物在地官前、中、后三室，特别是后室，以八重宝函等为“中轴线，分前后左右，成双成对，重叠放置，对称分布”（页146）来看，它们放置何处，非随意为之，而是深思熟虑，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的。其独特的指导思想，构思理念，文化内涵，值得玩味，深入探讨。

四、多视角全方位展现文物图饰

《法门寺文物图饰》，将一些重要文物图饰，进行了自上而下，从外到里，全面的立体展示。例如页150—170八重宝函。从由小到大，一字排开的六重宝函，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的浮雕如来说法，四大天王，观音菩萨，普贤文殊，金刚、神将，夜叉、小鬼，弟子、童子，穿插其间的蔓草、团花、莲瓣、西番莲、海棠花、海石榴、菩提树、菱、宝相团花、凤鸟、行龙、飞天、双凤、鸿雁、鸳鸯、迦陵频伽鸟、鱼子、流焰、流云和金刚杵等纹饰，金筐、宝钿、红宝石、绿松石珍珠装的点缀，到宝函的前司前，后铰链与函盖的连接，展现无余。页449—464，通过正面全身照，面向东南西北像，头部特写，盛发愿文金匾的鎏金银荷叶盘，莲座造型，莲座上密宗主佛大日如来三身咒轮，五佛种子，诸位菩萨，四方诸天，八大明王，鎏金银捧真身菩萨底座内壁的双龙绕杵图等，把有唐一代规模最大的迎奉法门寺佛祖真身舍利的最重要供品——捧真身菩萨的“庐山真面目”，尽展眼前。

此外，页184—188鎏金四十五尊造像盖顶银宝函，页204—206鎏金迦陵频伽纹壶门座银棺，页254—256鎏金仰莲瓣圈足银水碗，页319—322鎏金蕾纽摩羯纹三足架银盐台，也都被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法门寺文物图饰》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为法门学研究提供了较全面系统特别是新刊布的原始资料。

研究工作讲究尽可能详尽地掌握有关课题的全部原始资料，或曰“竭泽而渔”，或曰“一网打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爬梳、研究，从中得出符合事物本质的规律性结论。

过去的法门学研究中，一般人很难见到较全面系统的原始资料。已正式出版的资料，由于法门寺地宫发掘时间紧迫，客观条件限制，题词和镌文等出自多人之手，印刷质量问题，同一文物文字有所出入，屡见不鲜，因而研究工作难以避免出现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乃至失误。



例如我曾写过一篇考释法门寺地宫题词的拙文。依据的，是我当时能够找到的已正式发表的多种有关专文及拓片。读了《法门寺文物图饰》，才知道我的依据并不完全。该书辑录的不少地宫题记我没读过。如地宫出土其它残石上题词：页133“文干”。页134“寿一心供养”、“□□一心供养”、“□□□掖庭局”、“□□平”、“襟□□”、“祁”、“祁□□”、“□□□朝”、“将军韩朝”、“□祁再舜”。页135中17处“一心供养”，人名有“□男”、“□□□赵磨子”、“□磨子”、“二弟子□公(?)主(?)”、“□□娘”、“□□娘”、“□娘”、“□男”。页136“程弃昌”、“杨□□”、“谒者监薛昌仪”、“弟子□□一心供”、“弟子卫□蛮一心供”。页137“祁再舜”、“□进”。页138“祐”、“养□□”。页140“净土”、“性”、“□晖”、“□□”、“□□□”。页111地宫第一道门门槛石上浮雕题名“胡□”、“赵氏”。页113地宫隧道石21题名“阿徐”、“李敬中”。页124—125地宫后室东壁砌室佛像与题记拓本，有多达约五百僧徒俗人。地宫后室门石16题记，有“田士□张”等。与过去出版论著中录文不同者，如页113，地宫隧道石45右神策军营田仓专知勾当迎启真身正将王倬(俦)，过去论著录文称“王伟”(《法门寺地宫》)。这些新资料虽不致于否定拙文对法门寺地宫题记的总体把握及结论，缺了它们，论述是不全面、准确的，毕竟是一大遗憾。

我撰写的另一篇有关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铭文研究的拙文，存在着同样的缺点。原因也是当时所能看到的资料有限。《法门寺文物图饰》中辑录的页259单轮六环铜锡杖，铭刻四十一字：“僧弘志、僧海云、僧智省、僧义真、僧玄依、僧志坚、僧共志、沙弥愿思、弟子李甌、薛氏父王惟忠、母阿李为从实”。页322鎏金蕾纽摩羯纹三足架银盐台铭文“四字号”、“小药焊”。页338鎏金蔓草纹长柄银勺铭文“重二两”。我没见过。页262素面云头银如意柄背铭文“咸通十三年文思院造银白成如意一枚，重九两四钱。打造作官臣赵智宗、判官高品臣刘虔诣、副使高品臣高师厚、使臣弘愨”。我见过的此文缺“弘愨”二字(《法门寺文化研究——考古卷》第160页)。

《法门寺文物图饰》，不是单纯技术性的文物图饰辑录，而是学术性强的研究工作。因为文物图饰需要鉴别、定年、定名、定性，解析内容，评估价值。由于法门学初创，涉及年代久远(东汉至清)，领域广泛(历史、佛教、考古、文学艺术等)。加之法门寺地宫面世已二十余载，时过境迁，文物流转，有些原物已难复睹，资料散逸，查觅不易，不少文物图饰的研究薄弱，甚至空白。缺乏扎实的基本功、广博学识，刻苦钻研精神，是难以将1500余件文物图饰的来龙去脉，丰富、复杂、深奥的内涵，讲得一清二楚的。

《法门寺文物图饰》作者韩生同志，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是随着法门寺博物馆的筹建而进入法门寺文化研究领域的。他不为商品经济大潮所动，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不畏重重困难，多年如一日地搜集文物图饰，一丝不苟地反复修订，精益求精，力求录文准确，图象清晰美观。对于一些暂时难以辨识名称、年代、内容缺失的残碑断石，如页47—48其它石刻，如实辑录，不妄加论述，反映了作者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作者还在汲取学术界研究成果、尤其是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对文物图饰进行学术诠释，在详细叙述其表象之同时，揭示学术价值之所在，是有较高学术水平。例如页249，作者在论述鎏金雀鸟纹银香囊时说：“不过以前人们都称其为‘薰球’，而法门寺地宫《献物账》明确记载其为‘香囊’，则更正了以前考古定名的偏差。同时，我们也明白了‘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从四川返回长安，让高力士到马嵬坡寻找杨贵妃尸体时，‘唯香囊在’之香囊不是用香料和丝织物缝制的香包，而是以金银制成的薰香器皿。”正因为香囊是不朽的金银质地的，故杨贵妃肉体等已腐烂泯灭，它却独存。较有说服力地揭开了这个多年未得科学解释的历史之谜。

《法门寺文物图饰》是一项工作量大、难度高的学术工程。它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法门学研究“更上一层楼”。韩生同志的工作，难能可贵，功德无量。



目 录

静观千年法门遗珍（葛承雍）	003
法门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李斌城）	007
绪论	013
一 历史概述	014
二 舍利供养	014
三 文物综述	015
四 法门寺文化研究	018
第一章 石刻文物	021
一 周魏石刻	022
二 唐代石刻	023
三 宋代石刻	032
四 金代石刻	034
五 明代石刻	039
六 清代石刻	042
七 其它石刻	043
第二章 真身宝塔	045
一 概述	046
二 真身宝塔	048
三 塔砖题刻	057
四 塔上佛经	060
五 塔上佛像	070
第三章 唐代地宫	103
一 概述	104
二 地宫布局	107



- 三 地宫踏步漫道.....108
- 四 地宫平台.....108
- 五 第一道门、隧道.....109
- 六 第二道门、前室.....114
- 七 第三道门、中室.....120
- 八 第四道门、后室.....122
- 九 地宫秘龕.....129

第四章 地宫文物.....145

- 一 概述.....146
- 二 舍利宝函.....149
- 三 金银器.....213
- 四 秘色瓷.....271
- 五 琉璃器.....288
- 六 茶具.....300
- 七 其他.....342
- 八 丝绸服饰.....373

第五章 地宫唐密佛舍利供养曼荼罗.....413

- 一 概述.....414
- 二 八重宝函——胎藏界曼荼罗.....417
- 三 四十五尊造像银宝函——金刚界曼荼罗.....425
- 四 捧真身菩萨——金胎合曼曼荼罗.....449

第六章 文物装饰艺术.....465

- 一 意蕴深厚的佛教艺术.....466
- 二 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467
- 三 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469

跋语（温玉成）.....472

后记.....475



绪论

法门寺是周原孔道旁的一座千年古刹，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以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亦称崇正镇，即汉时的美阳县治，唐时的岐阳县治）。东距西安110公里，西至宝鸡90公里；南临渭河，隔水与秦岭主峰太白山遥相对峙；北依美山，土地平旷，风光绮丽。《诗经·大雅·绵》曰：“周原膺膺，谨茶如飴”。1981年8月24日，明万历年间修造的十三级“真身宝塔”，在经过了372年的风雨剥蚀后，半边坍塌。1987年在重修砖塔、清理塔基时，发现了唐代地宫，从而使珍藏了1113年的唐皇室瑰宝得以面世，特别是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重现，轰动了海内外。这批文物在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科技、美术及中外交流等各方面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一 历史概述

法门寺古称阿育王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皇家佛寺。

据佛典和相关文献记载，法门寺始建于“西典东来”的东汉时期。作为寺院建筑一部分的真身宝塔，相传是古印度孔雀王朝的君主阿育王在世界各地所建八万四千佛塔之一。根据有关文献及法门寺周围的考古调查，其建寺确切的年代下限应是北魏文帝“初复佛法”之后至西魏时期，是国内最早的一处著名“灵境”。

大魏二年（558），被北周宇文氏集团任命为岐州刺史的北魏皇室后裔拓跋育，为讨好宇文氏，便对其视为“圣地”的古周原上的阿育王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建，“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闾闳，度僧以资之，刻石以纪之”，这是法门寺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但时隔不久，北周武帝宇文邕登基，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灭法毁佛运动。在这次法难中，初步兴盛起来的法门寺遭到了沉重打击，寺内建筑被严重破坏，只有“两堂独存”。

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二月，杨坚建立隋朝，改元开皇。“开皇三年，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法门寺也得到了恢复。开皇中改为“成实道场”。仁寿末，右内史李敏复修之。“大业五年，……此寺从废，入京师宝昌寺。其塔故地仍为寺庄。”由于隋文帝极好祥瑞，对法门寺西北的岐山乃感兴趣，“美其地泉”，建凤泉寺，立舍利塔。因而法门寺在隋代乃受冷落，成为专门弘扬成实宗的寺院。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昌盛时期，法门寺因此发展到了它的极盛时期。武德元年（618），高祖李渊敕改阿育王寺为法门寺；高宗显庆四年，赐名会昌寺；中宗于景龙四年旌表为圣朝无忧王寺，塔曰“大圣真身宝塔”；文宗开成年间由于寺院上空出现了五色祥云，诏改为“法云寺”；武宗会昌五年，法门寺遭到极大的破坏，殿宇拆毁，僧人被逐，“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懿宗年间，由于寺有佛指舍利，因改名为“重真寺”。

五代时，偏安于关西的李茂贞，对法门寺进行旷日持久的修复。这是会昌法难之后官方对法门寺进行的规模最大宏大的修葺。

宋代，法门寺保持了唐时二十四院之规模，僧众甚多，徽宗亲题“皇帝佛国”匾额于山门。这一时期，法门寺区域不但有所扩大，同时还开设了水磨、浴室院等，其香火之旺，仅浴室一院即可“日浴千人”，寺院经济非常发达。

明洪武年间，改“重真寺”为“崇正寺”，知县杨瞻并改该寺所在镇名为“崇正镇”。隆庆三年（1569），唐时所建之四层木塔朽塌。万历七年（1579），扶风人杨禹臣、党万良等重修法门寺塔，因属民间捐资所修，故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才竣工，历时三十年。

清代的顺治、光绪年间对法门寺均有修葺。尤以光绪十年（1884）合镇绅民商贾同力复崇法门寺遗址，工程浩大。民国二十八年，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著名居士朱子桥将军募款五万大洋再修法门寺，并请回大成法师住寺主持佛事，其目的在于希望大众精诚团结，护国息灾。

1981年法门寺真身宝塔半壁坍塌，1987年重修时发现唐代地宫及瘞藏的佛指舍利和唐代供佛宝藏。

二 舍利供养

在佛教发展史上，位于“鹑首之郊，凤鸣之境”的法门寺，因其瘞藏佛指舍利，随着印度佛教的衰落，其特殊地位日益显现出来。北周以降，王室显贵纷纷前来膜拜供养。隋唐时期，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由于佛骨舍利的特殊影响，由于帝王“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政治需要及其对佛教的重视支持，佛教迅速兴盛起来，这种兴盛实际上是从法门寺起步的。特别是唐代，这里成为皇宫之外的内道场，既是皇家祈愿、供养的场所，又是诸帝迎奉佛骨的“护国”总道场。佛事隆盛最为重要的表现，莫过于法门寺佛骨舍利的迎送与供养。

最早敕令开启地宫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五年，李世民接受岐州刺史张德亮的奏谏，敕令首次开启地宫，



展示佛骨，并敕令拓建寺宇，由此拉开了这一重大历史活动的序幕。唐代高僧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记：

“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德）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既出舍利，通现道俗，……京邑内外，崩腾同赴，屯聚塔处，日有数千。”这次开启地宫展示舍利，虽未迎入宫中，但为以后诸帝迎奉开了先河。

高宗显庆四年（659）李治恩准僧人智琮等的禀奏，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迎佛骨活动，并于显庆五年三月敕请舍利入东都洛阳宫内供养。此时武则天已参预政事。高宗、武则天不仅对佛祖真身舍利及法门寺进行了大量舍赐，而且为舍利制作雕镂穷奇的金棺银椁，“数有九重”，并在法门寺塔下为供奉佛祖真身舍利修建了地宫（亦即“石室”），龙朔二年（662）派道宣等人护送回寺。按照中国传统埋葬制度的最高等级，瘞埋于石室。这一举动，改变了印度次大陆用罽坛瘞埋舍利的方式，这对印度佛教仪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从而使佛教走向中国化的成熟。

武后长安四年（704），武则天举行了第二次奉迎活动。这次奉迎是武则天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崇佛活动，也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佛事活动之一。当时，命凤阁侍郎崔玄晖和法藏、纲律师等迎舍利于东都，供奉于明堂。次年，佛骨还未送回，武则天驾崩。中宗于景龙二年（708）派法藏造白石灵帐一铺，将佛骨送回法门寺。中宗、韦后为了表示虔诚，剪下头发，进行供养，亦表其以身侍佛之诚意，且刻石以记之。

肃宗李亨在安史之乱中登基，为了借助佛教影响巩固政权、稳定人心，便于上元元年（760）举行了第三次迎佛骨活动。但由于连年战争，国库空虚，因而迎佛活动规模较小，历时仅两月，便匆匆收场。

第四次迎佛骨是在德宗贞元六年二月，《资治通鉴》卷233载：“春，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这次迎奉距上次恰好三十年，实属按不成文规定，借助佛法以达统治民众之目的。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迎佛骨至长安，“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迎佛活动受到刑部侍郎韩愈的极力反对，因而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谏迎佛骨事件。

唐代最后一次迎佛骨活动发生在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关于这次迎奉，《旧唐书》、《资治通鉴》、《杜阳杂编》中均有记载。其规模之大，耗资之多，供品之丰富，都是历代所没有的。从有关文献看，这次迎奉从咸通十二年就已开始准备，迎奉时从法门寺到长安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并“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毳毛饰其宝刹。……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宝帐香舁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玛瑙珍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百斛，其剪綵为幡为伞，约以万队。……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佛骨迎入禁中，供养三日。然后“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

咸通十五年七月，懿宗晏驾。僖宗李儇即位，诏送佛骨于法门寺。这是唐代最后一次迎奉佛骨，历经两朝帝王，可谓盛况空前，将大唐皇帝奉佛之举推向了极至，自此，刮了200余年的佛骨旋风随后也因唐王朝的灭亡戛然而止。唐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初四，地宫封门，帝后王公所赐法器、宝函及大量供器秘藏于地宫，从而构成了灿烂辉煌的地下宝库。

三 文物综述

法门寺地宫文物是唐代皇室供奉的集群性器物，其中包括唐代地宫建筑遗址、四枚佛指舍利及为供养舍利而奉



献的金银铜器、琉璃、秘瓷、丝绸和石刻等物。这批文物制作精巧，形体优美，多有铭文；另外，品类繁多，等级高，宗教性极强。这对研究唐代文化、中国文化史、世界佛教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一）地宫建筑遗址：法门寺唐塔地宫，平面略呈“甲”字形，从南向北由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及秘龕组成，总长21.12、宽2~2.5米，面积31.48平方米，完全用石条铺砌而成。其建筑规模宏伟，是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所仅见的。据已发现的唐代陵墓形制及文献记载的唐代陵墓制度推究，这座地宫是仿唐帝陵而建造的，从而反映出唐代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崇程度。

（二）佛指舍利：法门寺塔地宫居于核心地位的，当属佛指舍利。文献记载，全国境内供奉佛舍利的著名寺院共有四处：即泗州普光王寺、代州五台山、终南山和岐州法门寺。而以法门寺供奉的“真身舍利”最为著名，影响最大。法门寺地宫共藏佛指舍利四枚，其中真身指骨一枚，其余三枚属于影骨。这四枚舍利的形状、大小基本相同，与地宫出土刻石记载相符。佛指舍利的面世，是佛教界的一件幸事，同时，也纠正了近代人关于法门寺佛指舍利的许多讹传。这些舍利，均安置于宝函之中，最多至八重（史载武则天曾用九重宝函安置舍利），至少也有三重。这完全是按中国古代埋葬帝王的棺槨制度瘞藏佛指舍利的，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三）金银器皿：地宫共出土121组（件）金银器，制作富丽堂皇，极为精美，是唐代金银器的重要发现，在许多方面其重要性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发现。这批文物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外，还有成套的茶具和各式各样的熏香用具，以及许多与佛教有关的器皿。其金银法器和供养器及瘞藏舍利的容器，既是研究佛教考古的宝贵资料，也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这批器物的制作单位以京城的文思院为主，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在这批金银器中，有一件盆外底壁镌“浙西”二字的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盆，应是南方进奉皇室的贡品，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金银器皿中最大最精美的珍品。说明唐代后期江南地区金银手工艺的水平在全国处于很突出的地位；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是唐懿宗特为供养佛祖真身舍利而打造的，是研究密教的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鎏金迎真身双轮十二环金花银锡杖，全长1965毫米，超过日本正仓院所藏之铜头锡杖，是目前所见形制最宏伟、等级最高的佛教法器。

这批金银器中有铭文的约占总数四分之一，铭文有一定的叙述格式，即负责制作的部门、制作原因、时间、器物名称、件数、重量、质地、工匠、监制官或僧人及职衔等。这对于鉴定文物，研究特定时代的生产和工艺水平、内官设置、社会关系及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发展趋势等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秘瓷、琉璃：法门寺出土瓷器16件，根据《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账》（以下称《献物帐》）记载：“瓷秘色碗七口，瓷秘色盘子、叠子六枚。”和出土文物相印证后得知秘藏于宝漆盒中的13件瓷碗、瓷盘、叠子即属“秘色瓷”。这一重大发现解开了中国古陶瓷研究史上悬而未决的秘瓷之谜。这批秘色瓷有实物，又有相应的文字记载，是千余年来首批可以被确认为“秘色瓷”的标准器，为研究唐代青瓷发展，以及了解瓷器上金银装饰的源头提供了实物依据。

这次出土琉璃器20件，多属唐僖宗所送供器。琉璃在当时与金玉同样贵重。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西亚玻璃制品便流通至我国，虽然中国曾仿制外来玻璃，但仍未能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唐僖宗奉佛的这批琉璃供器具有很浓郁的异域色彩，推测或为古代大食国的贡品。其中一些器物，不仅在我国罕见，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稀有的。

（五）丝绸织品：中国丝绸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唐代是我国丝织工艺发展的繁荣时期，无论是花色品种，还是织造技术和质量，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丝织品在千件以上。据《献物账》记载，属武后、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等供奉的就达七百余件，极为珍贵的是女皇武则天的供品“武后绣裙”。这些丝织品基本囊括了唐代丝织工艺的所有品类，有锦、罗、绫、纱、绢、刺绣、印花等。刺绣的加工技术有蹙金绣、蹙银绣、平绣、贴金绣、绣加绘等；印花技术则有镂空版印花、凸版印花、描金绘花、木版人物画等。其中的织金锦和蹙金绣是以前仅见于文献而从未见实物的首次发现。

（六）茶具：中国是茶业和茶文化的故乡。唐代饮茶之风极盛，“吃茶”之法十分考究，至陆羽时茶已被理论化为《茶经》，但实际操作之法失传。茶具传今无几，地宫出土烘焙、研磨、过筛、烹煮、饮用、贮藏等系列金银